

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

方广铝

内容摘要:本文对什么叫“装帧”作了新的定义,并对现存汉文敦煌遗书的各种装帧形式进行探讨,指出在汉文敦煌遗书中共存在卷轴装、梵夹装、缝缀装、粘叶装、混合装、经折装、旋风装、棍夹装、单叶粘边装、单叶装等十种装帧方式,并对这十种装帧方式的起源做了简单的考索。

关键词:书籍装帧 敦煌遗书 写本装帧

一、引言

文字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定阶段。由文字组成的文献超出—定的篇幅,非其载体之单一单位可容纳时,便需要用某种方式编联其载体之相关单位,使所抄文献成为—个整体,顺畅可读。这是书籍装帧所以产生的前提。不言而喻,书籍装帧所以产生的另—个前提是出现可移动的书写载体。如果书写载体不可移动,假设文献书写或刻画在大地、洞窟、岩壁、壁画(如榜题),则不存在载体的装帧问题,存在的是如何指示所刻画文献的阅读次序的问题^①。

由此,笔者认为:所谓“装帧”,其基本含义是用某种方式将可移动书写载体的不同单位汇拢、编联起来,使载体上的文献成为—体,有序可读。由于不同载体适用的装帧方式不同,故书写载体便与装帧形式及其发展息息相关。

《尚书·多方》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知殷商时期已使用简牍及甲骨作为书写文献的载体。此外我们知道,有些殷周彝器上铸有文献。但至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铸在彝器上的文献均为短篇,这应该与彝器本身的形制有关。笔者寡闻,不知是否有长篇文献,分别铸在不同的彝器上,使这些彝器成为完整的一组。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则彝器文献的装帧自然应该成为研究

①任何—般都有例外。如匾牌、楹联大多书写在可移动载体上,它们—般有装饰而无装帧,其阅读顺序由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阅读习惯决定。

的对象。但所谓一组那样的彝器,仅为本文的假设,故此处不赘^①。且如上所述,《尚书》仅谓“册”、“典”,不言其他载体。起码在《尚书·多方》作者心目中,彝器上的文献与“册”、“典”中的文献,是否可以归为同一类,恐怕也可以再研究。

据目前所知,甲骨一般用于占卜,卜辞一般较短,一块甲骨可以刻下。诚如此,则甲骨文献无需编联。但是否有较长卜辞需要分别刻写在不同的甲骨上?起码我们知道,针对同一事件的占卜活动有可能连续举行数次,分别使用不同的甲骨,故不同甲骨上的卜辞可能相互有关。据说,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其原始存放状态往往是一窝一窝分别存放的,每窝所存甲骨数量不等,且甲骨上附有刻契符号。则每一窝存放的甲骨上所刻文献是否相互有关?又,所谓的“一窝一窝”,是否即为当时的档案存放方式?诚如此,每窝所存甲骨应有关联,其上的刻契符号或即为反映其关联的标记,亦可视为中国古籍装帧的原始形态^②。此外,甲骨是否仅用以占卜,不用于记录其他的文献?凡此等等,笔者知见有限,不敢遽断,敬待能者。

至于简牍,“册”字之形态已经说明其装帧形式。可以想象,如《盘庚》那样篇幅的文献,书写时一定使用了多枚简牍。故如将《盘庚》书之于简牍,一定需要编联成“册”。

与简牍大体同时的书写载体还有所谓“缣帛”。从墓葬出土及敦煌遗书可知,帛书至少有两种保存方式:折迭与滚动条。笔者尚未考察过折迭帛书的原物,故此处不赘。滚动条的帛书,无疑影响了后代纸质卷轴装的产生。也就是说,古籍装帧的演化除了与书写载体相关外,还与本民族一定的文化传承有关。

本文拟介绍敦煌遗书中纸质写本的装帧形式并探讨它们形成与演变的由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探讨汉文纸质写本,不涉及其他文字的纸质写本。

二、敦煌遗书中的纸质写本装帧简介

现知纸质写本敦煌遗书中保存着如下装帧形式:

(一)卷轴装

如前所述,卷轴装上承帛书而来。从敦煌遗书看,卷轴装有两种形态:手卷与挂轴。

1. 手卷

手卷在敦煌遗书中为最大宗,亦为我国古籍写本时代最通行的装帧形式。从敦煌遗书看,一个标准的手卷,从右到左应具备缥带、天竿、护首、卷芯、

^①编钟非文献,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需要考虑的是秦石鼓。一般认为十个秦石鼓所刻《猎碣》应为同一文献。但石鼓流传历史比较复杂,其原始形态已难以复原。故在其原始形态复原之前,对不同石鼓的先后编联形式,缺乏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

^②甲骨学界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刻契符号,实际是制备甲骨时留下的刮削痕。

拖尾、尾轴等部件。各部件均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态,此不赘述。

2. 挂轴

敦煌遗书中挂轴仅数件,如塔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其形态与现代挂轴基本相同。

(二) 梵夹装

汉文梵夹装这种装帧形式源于随佛教入华的西来“梵夹”。说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关于西来“梵夹”及由此衍生的汉文梵夹装,此前国内外中国书史研究者有种种模糊认识。笔者在《谈梵夹与梵夹装》(上)一文中对西来“梵夹”作了澄清,指出由于载体的不同,西域“梵夹”的形态也不同;古代汉文典籍中的“梵夹”,主要指代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为贝叶式梵夹,一种为桦树皮式梵夹^①。

汉文梵夹装乃仿照贝叶式梵夹而来,又出现若干略有不同的变种。其中有的变种与所用纸张的厚薄有关,故将纸张粘贴为双层使用;有的变种显然受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敦煌的藏文佛典的影响,故中间不打穿线孔洞,直接用绳捆绑;有的则根据所用纸张大小剪裁成自认为合适的大小,不顾忌西来梵夹应为长方形的规范。具体情况,将在《谈梵夹与梵夹装》(下)中进一步说明。

(三) 缝缀装

缝缀装的基本形式是以若干张(一般为三到四张)纸摺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对折以后,按序迭摺。然后用一种复杂的穿线技术,将如上迭摺的单元连缀起来。其外观有类于现代洋装书的一个印张。如其散落,折痕上会有针缝孔洞。从渊源上讲,它应源自桦树皮式梵夹。

在此对“缝缀装”的命名做一个说明。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家图书馆整理敦煌遗书时发现这一装帧形式,一时无以命名。一日正在研究,图书修整组组长杜伟生先生到敦煌编目组来,共同研究之下,他忽然回忆起:曾在某本古书看到对这种装帧形态的记载,说回去找找。过了几天,拿来《四库备要》本宋张邦基著《墨庄漫录》。其中引王洙言,谓:“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缀,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馀,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缀之弊也。”既然古代有记载,于是我们商议可以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之为“缝缀装”,并由此顺带解决了敦煌遗书中出现的另一种装帧形态——粘叶装——的命名。

最初,我们仅在国图敦煌遗书的目录草稿中使用这一称呼,但没有正式撰写文章。90年代后期,应宁夏社科院牛达生先生之邀,帮助他整理从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时,亦发现这种装帧,且形态有新的变化。我把考订结

^①方广钊:《谈梵夹与梵夹装》(上),《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33-460页。

果交给牛达生先生,并告诉他这种装帧应称为“缝绩装”。牛达生先生在《文献》2000年第2期发表《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绩装》,公布了这一成果。其后,我于2000年5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所出《藏外佛教文献》第七辑所收《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的行文中,对缝绩装有顺带介绍,杜伟生在2003年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中,专节介绍了这种装帧的形态。

十多年后,从网上看到台湾温台祥先生2014年11月在一次讲座中批评“缝绩装”这一命名,指出张邦基所引王洙言有误,王洙原文作“缝缀”,而非“缝绩”^①。查核王洙原书,确如所言。我觉得温台祥先生的这一批评有道理,其后撰文,一律改为“缝缀装”。

由于各种原因,笔者至今尚未对缝缀装撰写专门的论文,拟待暇时详述笔者对这一装帧的观点。

(四)粘叶装

粘叶装乃将一张长方形的纸张对折,使之成为近似方形的1纸2叶4个半叶。然后在折痕处抹上浆糊,使其与另一张同样对折的纸张粘接。如此逐一粘接,成为一册。

在实际考察中,发现粘叶装亦有种种变种:有中间夹杂未经对折的纸张,亦即仅为1纸1叶2个半叶者。有利用已废弃佛经的空白背面制成,其法为两次对折,第一次对折将有字的正面折在里面,无字的背面折在外面,然后再次对折,由此形成1纸4叶8个半叶。原来抄写经文的正面,折迭为4个半叶,均在内;原来背面的空白处均折迭在外,亦为4个半叶,用来抄写新的文献。有粘叶以后包背者,有粘叶以后线缀者。线缀者,其线缀方式又有不同。此外还衍生出混合装,请参见下文。

关于粘叶装,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发表《谈粘叶装》一文加以研究,因刊物篇幅关系,该文在发表时有较大删节,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故在将该文收入笔者的《敦煌遗书散论》^②时,恢复该稿原貌。2016年,又通过对敦煌遗书粘叶装《文心雕龙》的考察,指出最迟到公元8世纪初,粘叶装已经非常成熟^③。

(五)混合装

虽然前此有研究者撰文称敦煌遗书中存有蝴蝶装,但实际所指的均为粘

①温台祥:《是缝缀装不是缝绩装之考证》(节录),<http://grace2002.pixnet.net/blog/post/59456806-%E7%AC%AC%E5%8D%81%E7%AB%A0---%E6%98%AF%E7%B8%AB%E7%B6%B4%E8%A3%9D%E4%B8%8D%E6%98%AF%E7%B8%AB%E7%B9%A2%E8%A3%9D%E4%B9%8B%E8%80%83%E8%AD%89>。

②方广钊:《谈粘叶装》,载《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4-183页。

③方广钊:《现存最早的粘叶装书籍——敦煌遗书斯05478号〈文心雕龙〉装帧研究》,《文献》2016年第3期,第3-13页。

叶装。笔者至今未见敦煌遗书中有纯粹的蝴蝶装,亦未在唐宋的写本中发现纯粹的蝴蝶装。笔者以为,这或者因为蝴蝶装更多用于刻本。但敦煌遗书中有些粘叶装,偶尔确有若干书叶采用蝴蝶装的方式粘接而成。如BD09159号《天地八阳神咒经》共20纸,其中10纸的粘接方式为粘叶装,10纸的粘接方式为蝴蝶装,且两种方式相互错杂。笔者把上述古籍的装帧方式称为“混合装”^①。

(六)经折装

经折装,后代大量用于佛教经典,这或者就是“经折装”一词命名的由来。由于这种装帧形式至今依然可以见到,人们对它比较熟悉,故本文不再介绍它的具体形态。

笔者曾经撰写《敦煌遗书斯5665号与经折装》,论述敦煌遗书中的经折装^②。所以选用该号,乃因该号一面抄写于唐高宗时期、一面抄写于武周时期,可以由此考察经折装出现的年代。但该号被剪为几十个碎片,整理颇为费事,文章中用大量篇幅介绍各碎片的关系,显得啰嗦累赘,反而冲淡了文章主题。

或由于废弃的缘故,现存敦煌遗书经折装均无首尾护板与环包书壳。这与宋元明清^③经折装不同。当然,也可能唐五代经折装本无护板与书壳,护板与书壳都是后代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还要再研究。

(七)旋风装

旋风装是中国书史研究者至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装帧形式。

“旋风装”又称“旋风叶子”、“龙鳞装”、“鱼鳞装”,其装帧形态是将抄写好文献的纸张的一端抹上浆糊,然后逐一排比粘贴在一张底纸上,粘贴时每纸略微错开距离,如鱼鳞然,故称“鱼鳞装”或“龙鳞装”。完成以后,可以如卷轴装一样卷起。这种滚动条,如略略放松,从一端看,内部书叶逐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自然界的旋风,故称“旋风叶子”、“旋风装”。

应该说,旋风装的装帧形式,在古书中记载得很清楚,并无歧义。但由于这种装帧失传已久,人们见不到实物,各以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古书的记载,于是纷纷不已。有的研究者主张故宫现存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为现存旋风装的实物。该《刊谬补缺切韵》的确符合古书中对旋风状的记叙。但又

①参见BD09159号图版与条记目录。该号图版请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94—104页。该号条记目录请参见上书条记目录部分之第18—19页。条记目录中“单叶”,指一纸一叶;“双叶”,指一纸两叶。“单层”,指普通的纸张;“双层”,指将两张普通的纸张粘贴起来而成的两层的纸张。“粘叶”、“蝴蝶”云云,指相邻两纸的粘接方式。

②方广钊:《敦煌遗书斯5665号与经折装》,《文史》2005年第1期,第119—148页。

③宋元经折装有环包书壳,但首尾护板处理相反。宋代将首部第一纸粘在书壳底部,尾部加护板,用书壳环包。元代将尾部最后一纸粘在书壳底部,卷首加护板,用书壳环包。明清仅有首尾护板,无环包书壳。

有研究者提出,该《刊谬补缺切韵》曾经后代重新装修,装修后是否依然保持原貌,现在难以确证。故这件《刊谬补缺切韵》不能作为研究旋风状的依据。

其后,国图杜伟生发现英国图书馆斯06349号《易三备》,认为这种用棍子夹住纸张一端的装帧方式应该属于古书中的旋风装,并撰写《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加以考订^①,此后又在他所撰《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中有简单介绍。由于法国图书馆所藏伯4924号亦为《易三备》,可与斯06349号缀合,故国图张志清、林世田撰《S.6349与P.4924〈易三备〉写卷缀合整理研究》^②,赞同杜伟生的观点。此外,李怀乾自己创造一种装帧形式,认为前人所说都是错的,旋风装应该如他所制作的样品然^③。我认为,以上几位先生忽略了古书对“旋风装”的记载,因名摹状,主要从“旋风装”这一名称去猜测这一装帧形式的形态,这种研究方法恐值得斟酌。在国家珍贵古籍评鉴过程中,侯冲从云南图书馆所藏大理北汤天遗书中发现与故宫《刊谬补缺切韵》同样装帧的旋风装^④,说明古人诚不我欺。古代确有在一张底纸上按序鳞排的“旋风装”。

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至今没有发现如《刊谬补缺切韵》那样的旋风装。但英国图书馆藏斯06204号的装帧即为在一张底纸上鳞比栴次排列粘贴诸纸,与古书记载中的旋风装相吻合,应该就是所谓的“旋风装”。由于该斯06204号也经过修整,诸纸已被揭下,并非原始状态,但底纸上鳞比栴次的痕迹依然清晰。

我认为,由于古代写本装帧均为手工单独操作,故既有一定的规范,又很容易出现种种变种。所谓“旋风装”,既有将单叶纸的一端粘贴在底纸上,此时每纸呈现一叶两个半叶,抄写时,一般将文献抄写在两个半叶上。也有将单叶纸对折,成为两叶四个半叶,然后将其一端粘贴在底纸上。由于此时每纸有两个半叶被折叠在里面,无法写字,故真正抄写文献的是折叠在外面的两个半叶。当时抄写文献所用纸张的大小规格、形态也不一致。但其基本特征均为这些抄写文献的纸张都粘贴在一张底纸上,故粘贴完成以后可以底纸为依托卷成卷轴,从一端观察,其外观犹如“旋风”。

(八)棍夹装

那么,敦煌遗书中类似斯6349号那样用棍子夹住一端的装帧,如果并非古籍中所谓的“旋风装”,又是一种什么装帧呢?

我认为,此类装帧形式,至今在古书中未见记载。应该属于古人另行创造的一种非正规的装帧方式。不妨按照它的基本特征,暂命名为“棍夹装”。此种装帧,法国图书馆亦有收藏。这种装帧是敦煌地区特有的,还是从内地传入

①杜伟生:《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文献》1997年第3期,第181-189页。

②张志清、林世田:《S.6349与P.4924〈易三备〉写卷缀合整理研究》,《文献》2006年第1期,第47-54页。

③李怀乾:《旋风装止谬》,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07938f0100rmfq.html。

④侯冲:《从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看旋风装的形制》,《文献》2012年第1期,第40-48页。

敦煌的,目前都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九)单叶粘边装^①

同样仅见于敦煌遗书,不见于古籍记载的装帧形式还有一种,我称之为“单叶粘边装”。实物可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共14纸,现编为15号^②,按照所抄文献的内容,这15号的先后排序应为BD03510号→BD03505号A→BD03505号B→BD03501号→BD03542号→BD03549号→BD03550号→BD03544号→BD03546号→BD03547号→BD03504号→BD03541号→BD03507号→BD03503号→BD03538号。

这种装帧的特征是:

1. 一个文献有若干张单叶纸组成。

2. 每张单叶纸均为两面抄写。即:正面抄写满以后,转到背面接着抄写;背面抄写满以后,转到另一张单叶纸的正面接着抄写,直到文献抄写完整。

3. 每张单叶纸均有左右两端。每端用一条宽约3到4厘米左右、高度与单叶纸相等的纸张,对折以后,用浆糊粘接在该单叶纸某一端的上下,每端形成1.5到2厘米左右的一条粘边,粘边的折痕向外。该粘边对单叶纸的左右两端起到保护作用。

4. 每张单叶纸及其粘边上,未见序号,未见针孔,未见硬物挤压痕迹。

这是一种目前尚需研究的装帧形式。

首先,BD03510号等14张纸是同一人所抄的同一种文献,文字相连,从实际使用需要来说,这14张纸应该用某种装帧形式予以汇拢、排序。

其次,现存14张纸的左右两端均有粘边,可知古代的确曾对每张单叶纸施加过某种加工。

但如前所述,目前这14张纸未见针孔,亦即未曾采用线缝连缀;未见硬物挤压痕迹,亦即没有采用类似棍夹装那种一端用长形木条加以夹定的方式。从保存现状看,似乎原本就是散叶,本文所谓的“粘边”,也可能只是一种保护性措施,而非“装帧”方式^③。

散叶而无序号,且多达14张,又如何能够正确地按序阅读?即使不采用某种连缀散叶的方式,仅用盒子将这些散叶装起来,如每叶不作编序,依然很容易产生混乱。由此看来,这种单叶粘边的文献,还是应该有一种我们现在还不

①这种装帧形式,我原来把它命名为“单叶缀边装”。但最近觉得此处不应用“缀”字,故改为“单叶粘边装”。

②原为14张单叶纸,但BD03505号被撕作两截,现按照编目体例分别编为A、B两号,故共为15号。

③比如书册中的“包背”,目前的书史著作都称之为“包背装”,我则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包背”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它仅作为粘叶装、缝缀装、蝴蝶装、线装等书册本装帧形式的一种辅助方式,起到进一步加固书背的作用。既然它不能独立存在,也就不能单独列为一种装帧形式。

了解的装帧形式(哪怕是盒装)和目前尚未发现的排序方式。它的装帧形式、排序方式到底是什么?有待进一步研究。这种“粘边”到底是保护方式,还是装帧形式,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十)单叶装

单叶装实际指用单张纸抄写的文献,如契约、书信等篇幅不长的文献,单叶纸即可抄写完整。由于这种单叶纸文献实际上并不需要装帧,所以纸上没有任何装帧的痕迹,与单叶粘边装左右两端均有粘边,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从一个方面讲,既然没有对此类单叶纸作任何装帧处理,就不应该列入书籍装帧的范畴。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此类单页纸上抄写有完整的文献,故也不妨把此类单叶纸看作是文献的又一种独特的装帧形式。

实际上,就书信而言,有的有信封;敦煌遗书中有些书信,卷为一卷粘封,且有骑缝签押。这些形态是否可以算作装帧,可以研究。出土北宋墓葬中的寿生阳牒,可视为死者生前与地府所签署的契约文书,亦有骑缝签押。故有关此类单叶纸的装帧,还可以再研究。

三、敦煌遗书纸质写本装帧演变探略

上面简单介绍了在敦煌遗书中存在的十种(实为九种)书籍装帧形式。下面简单谈谈我对上述装帧形式演变发展的一点粗浅看法。

如上所述,古籍装帧的演化除了与书写载体相关外,还与本民族一定的文化传承有关,也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至于敦煌遗书中各种装帧形式演变的线索,我认为大抵如下:

首先,卷轴装继承的是帛书的装帧方式。这一点没有疑问。

其次,梵夹装继承的是西来梵夹中“贝叶梵夹”的装帧方式,这一点也没有疑问。

第三,缝缀装起源于西来梵夹之“桦树皮梵夹”,两者均为缝缀而成。

第四,粘叶装则是缝缀装的改进型,是中国人的创造。前引王洙语可说明这一点。就发展源流来说,它从经折装演化而来,可参见笔者《谈粘叶装》。

第五,蝴蝶装是粘叶装在刻本时期的变种,它的出现主要与刻本所用纸张变薄有关。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叙述。但作为一种纸张的粘接方式,蝴蝶装在写本时代已经出现,所以出现粘叶装、蝴蝶装混杂的混合装。但虽然出现这种粘接方式,并未独立、广泛流传,敦煌遗书中没有发现标准的蝴蝶装,或可成为其并未广泛流传的证据。

第六,经折装是中国卷轴装与西来“贝叶梵夹”两者结合的产物。理由如下:

梵夹之贝叶装利用贝多罗树叶制备。树叶原本一张一张,只要根据需要截取中段,略加修整即可。但纸质梵夹装所用载体为纸张。纸张用抄子抄成,纸幅固定。如果制备为梵夹装,需要折迭以后裁开,然后打穿线孔洞。古书记

载,唐代纸张最长可达一丈。唐尺有大小之分,胡戟曾就国内现存唐尺30件择要予以统计,发现其短者仅28厘米,长者逾31厘米,他在比较诸家之说的基础上,推定唐大尺长度近29.5厘米^①。本文采用胡戟的成果,则长一丈的纸张约为295厘米。我们在敦煌遗书中发现长达140多厘米的纸张,大体是唐代长纸的二分之一。如果拿那样的长纸来制备梵夹装,无疑需要按照梵夹装的宽度割裁纸张。即使不用那种最长的纸,依然需要按照梵夹装的宽度割裁纸张。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都发现已经按照梵夹装宽度正反折迭,甚至已经画好打穿线孔洞圆圈,但最终没有裁开,直接抄写文献的遗书。即该件遗书原计划制作梵夹装,但最终直接书写,而这种正反折迭的形态,正是标准的经折装。上述实例的发现,可以证明经折装是人们在制作梵夹装的过程中发明的、比梵夹装更简便实用的一种装帧形式。

第七,旋风装是卷轴装与粘叶装的混血。

第八,棍夹装,非常规装帧,对后代亦无影响。

第九,单叶粘边装,非常规装帧,对后代亦无影响。

第十,单叶装,暂不讨论。

四、结语

敦煌遗书中各种装帧形式被发现以后,有研究者主张这些装帧形式出现在晚唐五代宋初,反映了中国书籍从写本到刻本演变时,曾经经历了一个装帧形式转换期,或称不定型期。笔者最初也持这一观点,但在对上述装帧形式的产生年代进行考察以后,觉得对上述观点尚需进一步斟酌。

现有明确证据,证明经折装、粘叶装、缝缀装、梵夹装在7到8世纪已经出现。因此,丰富多彩的装帧形式的出现,其内在动力不是写本到刻本转换的推动,而是盛唐文化大发展,特别是佛教文化大发展的体现。中国书籍在这个时候出现如此丰富的装帧形式,是西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作者简介】方广钊,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佛教。

^①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4-36页。